

中国与埃及 现行宪政法律制度比较^{*}

贺 鉴 乔建平

内容提要 中国与埃及同属发展中国家，两国在 20 世纪初先后开始尝试建立宪政制度。两国的现行宪政法律制度在国家形式、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这是由两国的国情和发展实践所决定的。中国与埃及虽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宪政发展道路，但两国应加强在宪政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与借鉴，为进一步完善本国的宪政法律制度而不懈努力。

关键词 埃及 中国 宪政 国家形式 国家结构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

作者简介 贺鉴，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湘潭 411105）；乔建平，湘潭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湘潭 411105）。

中国与埃及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在 20 世纪初开始尝试建立了宪政制度。中国百年宪政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过 3 种不同类型的宪法：“虚假宪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宪法。¹ 它们对中国宪政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4 年颁布了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而埃及 1922 年宣布独立（但实际上仍在英国的控制之下）。1953 年埃及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1956 年颁布了共和国首部宪法。从中、埃两国独立后宪政制度建设与发展的状况看，两国都从各自国情出发，同时注意吸收国外宪政建设的经验，与时俱进，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比较，从而相互借鉴与学习。

国家形式的比较

国家形式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宪政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式包括国家管理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它们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下来，从制度上限定权力的运行，框定国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保证国家的稳定。中国与埃及在宪政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形式。

（一）国家管理形式

国家管理形式，即国家政体或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埃及的国家管理形式是总统制民主共和制。1952 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

^{*}本文系贺鉴主持的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非洲国家宪法人权保护之比较研究”成果之一。

¹ 即（1）“虚假宪法”：包括清朝《钦定宪法大纲》（1908 年）、北洋军阀的《天坛宪法草案》（1913 年）及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 年）、《五五宪草》（1936 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 年）；（2）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 年 3 月 11 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3）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 4 部，分别诞生于 1954 年、1975 年、1978 年和 1982 年）。

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1953年埃及共和国建立，它宣布了君主制的结束和埃及共和国的诞生。1956年，埃及共和国颁布了首部宪法，从此实行共和制政体，采用总统制。埃及之所以实行总统制政体，无疑是受到了最早实行这种政体的美国的影响。非洲人向美国借鉴了一个不受约束的总统制，并通过“本土化”过程——他们给予了他们的总统更多的权力。^①在这种政体下，埃及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掌握着国家行政权，直接领导政府与任免政府高级官员。在萨达特、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更是形成了总统独大的现象，总统依托军队、警察、特务，大权在握，处于政治制度和政权权力的中心。^④在埃及，总统享有比其他共和制国家元首更大的权力。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管理形式上必然要实行民主共和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国的国家管理形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吸收人类宪政文明的普遍智慧而构建的社会主义宪政的结果，是对巴黎公社制和早期苏维埃这类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制的扬弃与发展。^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新中国的首部宪法。1954年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规定在以后的历次宪法中得到了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都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工作，受它监督。

我们由此可见，埃及与中国的国家管理形式都是民主共和制，二者却存在很大区别。在埃及，总统处于最高的权力地位，形成了以总统为中心的国家管理形式。而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国家管理形式。形成上述国家管理形式方面的差异与两国的近现代历史发展紧密相关。埃及在1922~1952年是名义上的独立和君主立宪时期，在这30年中，埃及政治处于连续动荡之中，各阶层人民强烈渴望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国家管理形式，在这种背景下，总统制共和制的国家管理形式应运而生。而中国自1840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长期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人民渴望当家做主的愿望十分强烈。为此，在宪政制度的设计中，中国就将人民代表大会置于最高地位，以确保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二）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处理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全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各个部分以何种形式和方式整合为国家的问题。

埃及是总统制共和国，全国实行统一的宪法，在总统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实行中央集权、分级管理的制度。1971年埃及宪法第一条规定：全国划分为省、市和村，它们又各自组成地方行政机构，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③目前，埃及全国划分为26个省，省下设县、市、区和村。由此可见，埃及是一种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与埃及一样，中国也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并且基本上是一种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的行政区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三级。目前，中国全国分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中国的特色在于根据本国国情，在一些地方设立了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

中国与埃及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存在统一的传统和实行单一制的渊源。埃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早在秦代也属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两国在

^① See Ali Mazrui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nd the Liberal Option in Africa: Myth and Reality”, in Kenneth W. Thompson Edited *The U. S. Constitu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Africa*,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

^④ 参见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② 参见文正邦：《依法行政的宪政之维》，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62~63页。

^③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各国宪政制度和民法法要览》（非洲分册），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反对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各自的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这为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奠定了思想基础。两国取得民族独立后,就以宪法规定的形式将单一制作为国家结构形式固定下来。事实证明,对埃及和中国而言,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根据宪法规定,中国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前提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是“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原则的生动体现。

国家机构的比较

国家机构是国家机关的总和。一国的宪政法律制度规定了国家机构的组成、设置、权力和相互关系。国家机构一般由国家元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¹和司法机关组成。在埃及和中国的宪政制度中,国家机构的设置和权力分配是与其国家形式紧密相关的。

(一) 国家元首

在埃及,总统是国家元首、最高行政首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警察最高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掌管和行使行政权。埃及宪法规定,总统还享有提议举行公民投票、紧急立法、一般立法和影响议会议员的构成的权力。埃及总统由选举产生,选举时由人民议会提名总统候选人,并提交公民投票。议会根据至少 1/3 议员的建议提出总统人选,该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 2/3 的票数,才有资格提交公民投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父母必须均为埃及人,并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且年龄不小于 40 岁的埃及人。总统每届任期 6 年。^④根据 1980 年埃及宪法修正案,允许总统无限期重新当选。2005 年埃及修改宪法,允许多名候选人通过直选进行总统选举,这被视为“走向自由与开明政治统治的有益的一步”^(四)。

在中国,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并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行使发布法律(命令)、任免权、外交权和荣典权。中国宪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 45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综上,埃及的国家元首——总统处于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掌有广泛的权力,并且实际上实行总统终身制。与此相比,中国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作为国家的象征,是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下行使权力,并且任期有严格限制。这些都是由于两国的国家管理形式不同而决定的。同时,埃及宪法赋予总统广泛的权力是为了结束国家动荡、实现政治稳定的产物。中国宪法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国家元首权力的限制是基于对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反思,基于对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理解的结果。

(二) 最高权力机关

埃及宪法规定,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议会。通过选举选出议员,组成人民议会。人民议会根据权力行使的需要设立不同职能的委员会。目前的人民议会通过下设立法委员会、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等 18 个委员会来行使它的立法和监督职能。人民议会任期 5 年。埃及首都开罗市是人民议会所在地。人民议会一般情况下应公开进行,且只有多数议员出席的议会会议才是有效会议。人民议会由总统在每年 11 月第二个星期四以前召开每年的例会,其至少持续 7 个月,由总统宣布例会闭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由

¹ 由于埃及的行政机关由国家元首(总统)、政府(内阁)、地方行政当局和国家专门理事会共同组成,并且行政权主要由总统执掌,政府实际上只是总统的办事机构,故下文中未将中国与埃及的行政机关进行比较。

^④ See “Egypt Constitution”, <http://www.egypt.gov.eg/english/laws/constitution/index.asp>. 后文中有关埃及宪法的相关内容均来源于此。

^(四) Jin Phipps et al “Middle Eastern Law”,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Summer 2006 Vol 40 Number 2 p. 601.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全国人大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每届任期 5 年。全国人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

埃及的人民议会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两国的权力机关。而实际上中国的全国人大的权力要远远大于埃及的人民议会，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在各个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埃及由于实行了总统制共和制，人民议会仅仅是作为三权分立的与总统和司法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且由于埃及的特殊国情，在实际运行中总统独大，议会弱小，人民议会的权力受到很大制约，被认为没有独立的立法和监督能力。事实上，它只是总统立法的“表决机器”，预算审批也只是流于形式。由于程序过于复杂，它对政府的质询监督几乎不具有可行性。¹ 作为埃及权力机关的人民议会的职权有待加强，以更好地履行宪法所赋予的立法和监督的权力。

（三）协商会议

1980 年，埃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设立协商会议，协商会议是议政机构。1980 年 11 月 1 日，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协商会议议员中 2/3 由各阶层、机构和派别选举产生，其中一半应是工人和农民；1/3 由总统任命。协商会议的主要职能是就修改宪法条款、宪法的补充条款、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涉及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有关条约、有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维护民主、以及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较之于人民议会，协商会议不享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等职能，只是一个咨询和建议性的机构。协商会议议员席位不少于 132 个，每届议员任期 6 年，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政府行政职务，每三年改选半数席位。

与埃及协商会议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其在中国不属于国家机构，而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宪法序言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8 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 5 年。

埃及协商会议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各自国家的议政机构。与埃及协商会议的议员相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由上届常委会民主协商决定，政协委员享有广泛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权力，更具有代表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埃及协商会议的定位是一个咨询和建议性的机构，这就决定它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限，但是埃及协商会议的特色在于有部分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并且规定了工人、农民代表的比例，任期内不得担任行政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反映基层民众的呼声，代表他们的利益。

（四）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被认为是埃及“最民主的国家机关”，“法院的判决是受到普遍尊重和适用于所有有关各方的”。^④ 埃及宪法规定，司法机关应做到独立，司法权应当由法院行使，并依法做出判决。法官应保持独立，任何机构不得介入司法事务。埃及的司法机关由各种不同等级的普通法院（包括简易法院、初级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最高宪法法院组成。埃及宪法第五章第五部

¹ See Larry P. Goodson and Soha Radwan, “Democratization in Egypt in the 1990s: Stagnant or Merely Stalled?”,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19, 1997, Issue 1, pp. 1–21.

^④ Ibid.

分,对最高宪法法院的权限做了规定。该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最高宪法法院是唯一被授权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实行司法监督的机关,并应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承担解释法律条文的立法原意。埃及还设立了社会主义公共检察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埃及宪法第五章第六部分对社会主义公共检察官的权限做了规定。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检察官应负责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的权利,保障社会的安全和它的政治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成果,并致力于社会主义行为。

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共同组成中国的司法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中央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地方设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特殊行业还设立了专门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与中国相比,埃及司法机构的最大特色在于设立了最高宪法法院,以此来维护宪法的尊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实践证明,最高宪法法院的设立是埃及宪政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成就,它在维护司法独立与公共自由、捍卫人权等方面起重要作用,这些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从长远看,中国应在适当条件下建立相应宪法适用或违宪审查的机构和制度。^①与埃及相比,中国的特色在于设立了各级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检察权,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实行监督,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比较

以宪法形式保护人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各国宪法一般都有关于人权保障的内容。^②宪政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尊重和保障人权^③,宪法必须以人权为核心。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一国公民人权的根本法律规定。同时,宪法对公民的义务也做了规定。

(一) 公民的基本权利

埃及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陈诉权;思想和言论自由权;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自由权;出版和新闻自由权;集会、结社权;劳动权;社会福利权;获得国家赔偿权;受教育权;个人自由权;维护尊严权;家庭、隐私不可侵犯权;居住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维护母亲和儿童的权利;保护妇女的权利;其他主体的权利的保护,如退役军人、在战争中和因战争而受伤的人、烈士妻子及其儿女在就业机会上享有优先权。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赔偿的权利;劳动权、休息权、生活帮助权和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受教育的权利;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老人、儿童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权利与利益。

埃及和中国的宪法都赋予了公民以基本的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同时对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和特殊群体的权利给予了特别强调。在2004年的中国修宪中,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第三十三条)之中,在我

^① 参见廖永安、文新:《论宪法的司法适用与民事审判权的界限》,载《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第39页。

^② 参见何文燕、曾琼:《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人权保障的另一视角》,载《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第42页。

^③ 参见蒋菊琴、董显堂:《宪政制度的本质、价值和实践意义》,载《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第59页。

国宪政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¹同时,宪法的修改案及其他的法律(如《治安处罚法》)相应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这是中国宪政法律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在第三世界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埃及这样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里,公民的宗教权利和自由是一项重要权利。埃及宪法虽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第二条),同时宪法又规定信仰和宗教自由(第四十六条)。^④这种制度安排既保持了埃及的阿拉伯特色,又为保护埃及公民的宗教权利提供了一个宪法根据,有利于保障非伊斯兰信教群众的宗教权利,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二) 公民的义务

在世界各国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同时也规定了相关义务。中国和埃及的宪法在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上存在异同点。

埃及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其民主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下列义务:劳动的义务;关心和维护道德,巩固埃及真正传统的义务;参加管理并监督具有公益福利事业的义务;保卫祖国的义务,依法服兵役是强制性的;保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成果的义务;保卫民族团结的义务;保守国家机密的义务;交纳捐税和公共支出的义务。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下列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保卫祖国,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依法纳税;劳动的义务;受教育的义务;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埃及宪法和中国宪法都强调公民在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都强调了维护国家、集体利益的义务,这体现了中埃两国所共有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埃及宪法提出公民有巩固埃及真正传统的义务,这体现出埃及重视传统传承的特色。中国宪法强调了父母和子女的相互义务,以及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中国和埃及有过相似的历史遭遇——都曾遭受外来殖民统治,独立后,都尝试着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宪政发展道路。中国和埃及的宪政法律制度在国家形式、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这是由于两国各自的历史和国情发展实践所决定的。总的说来,两国的宪政法律制度都在呈现“混合”发展的趋势。埃及是伊斯兰国家,曾经被法军占领,又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后在两极争霸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又被苏、美两国争相渗透。因此,埃及宪政法律制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伊斯兰法、大陆法、英美法、苏联法的多重影响,但总体上属于资本主义宪政法律制度的范畴。近代以来,中国法律的演进走的也是一条“混合”发展之路,在变迁转型过程中,中国法律又融入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法系等因素。⁴中国现行宪政法律制度在苏联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而且中国宪政制度植根于悠久绵延的文化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鉴此,中埃两国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加强在宪政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与借鉴,为进一步完善本国的宪政法律制度而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成红)

¹ 参见李伯超、厉亮亮:《民生纾困与宪政改良》,载《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第52页。

^④ See Yustina Sakhi, “Law, the Rule of Law,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Egypt”,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4, December 2004, p. 75.

^(四) 参见高明暄、张杰:《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载《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第22页。

⁴ 参见夏新华:《混合法系发展的前沿》,载《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第30页。

Syria– Iran Relations in Khomeini Era

Zhang Ni & He Zhilong

pp. 30– 35

The Islam revolution that dominated by Khomeini had completely changed Ira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which set up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Syria– Iran relations. Syria thought that "Revolutionary Iran is the Strategic alliance". During Iran– Iraq war, as an Arab state, Syria supported for Iran in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nd promote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consolidation of Syria– Iran bilateral relations was stressed for the same strategic interests despite the some different positions among them on Lebanon issue. Syria– Ir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relations in Khomeini Era had brought fundamental influences to both Iran and Syria, as well as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ception of Kaplan's Jewish N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Civilization

Hu Hao

pp. 41– 47

Kaplan was the leader of American Reconstructionist Judaism Movement and his Jewish civilization theory emphasized the national unity of Judaism as a kind of spirit and culture of the whole. He saw Judaism as a religious civilization of evolution and tried to interpret Jewish national view in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sense. He denied such traditional Jewish ideas like "God's Chosen", "Exile" and "Save", discussed the implied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universal of Jewish nationality. He emphasized that

th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needed not only the central demonstration of civilization core identity but also the cultural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 of overal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so that he admitted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Israel as the spiritual home of Jew and the civilization creation role of world Jewish people. He appealed to more great Zionism and to realize Jewish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called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Jew and to promot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progr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s of China and Egypt

He Jian & Qiao Jianping

pp. 48– 53

Both China and Egypt belo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y all tried to establish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mong the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s of the two countries such as form of stat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itizen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Both China and Egypt have implemente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ays in conformity with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it is still necessary for them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s construction so tha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s.